

珍藏一座城的记忆

3

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法国画家奥古斯特·波塞尔(Auguste Borget 1808-1877)从澳门来,踏上了彼时海外贸易繁荣的国际大都市——广州的土地。他准备驾舟一叶,在珠江绘写生,记录广州的风土人情。像许多初来广州的西方人一样,闻名已久的“河南寺”是他迫不及待要游览的首站。在十月的晴空下,波塞尔穿过拥挤的舟艇,踏入寺门,顿觉万籁俱寂,浑然出世,被那宏伟巍峨的殿宇、高大威严的神像深深震撼……这座西方人口中与笔下庄严壮丽的“河南寺”,便是清代的“广州名片”之一、岭南名刹海幢寺。

广州海幢寺建于明末,为南汉千秋寺旧址。“寺门临江,隔江望之,如在天上”,因其亦寺亦园的独特环境和人文历史而闻名遐迩。明末清初,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一大批书画僧,在佛事之余,潜心诗文书画,并以海幢寺为主要活动场所,赋诗讲学,与文士雅集唱酬,名噪一时,历经几代而风雅不减。清代的“海幢寺”,更被官方选作对外接待点和外商游玩地,成为当时中外人士交流之地及中国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之一。

数百载光阴弹指过,海幢寺以艺术展览的形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“禅风雅意——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”近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,展览以岭南寺僧书画和海幢寺文化艺术为切入点,对海幢寺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。

如何从文化的视角,重新认识“老广们”熟悉的海幢寺?《名家话收藏》版请来策展人、文史专家,细说海幢寺在岭南寺僧书画艺术、中西文化交流及禅意美学传播等方面的贡献,让更多广州人走进海幢寺,重新认识广州历史上这一独特的文化坐标。

●李遇春
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

●林子雄
广东省方志馆研究馆员、
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

●陈澧
文博研究馆员,现为广东省
文物保护单位专家委员会委员、
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

●任文岭
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与
研究部副主任、副研究馆员、
“禅风雅意——岭南寺僧书画
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”策展人

策展人语

一座佛教寺庙,与省级博物馆联手呈献一场艺术展览,放眼全国皆属比较少见。“禅风雅意——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”开展一周以来,引起了很多人“老广”的共鸣。

任文岭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了策展初衷和展览脉络:近年来,广东省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、积极整合和利用广东本土文化资源,曾举办多个具岭南文化特色

专家说

壹 岭南寺僧书画艺术:堪称广东乃至全国宗教及艺术发展史上的奇观



展览现场

自唐代以来,岭南佛门中就不断出现一些能书善画之人。明清易代,广东士大夫有逃禅的风气,身为前明举人,天然和尚开法岭南,座下高僧云集,以遗民文士入禅者为多,著名学者屈大均便是天然的弟子之一。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僧人,在岭南书画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此后历三百年风雅不减,诗书画僧代有人出,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岭南寺僧书画的兴盛这一文化现象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背景?

陈澧:岭南的“僧人书画”始于明末清初。当时以天然和尚释函星为核心的一批书画僧,在出家之前皆为文人学士,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,擅长诗文书画。他们出家之后又未能忘情于世,胸中儒、释交融,遂以诗文书画来宣泄“国破家亡”的悲愤,于是“僧人书画”大兴。而之后几代的僧僧,无论是其出家动机、或是其心绪状态,已经迥然不同于清初的前辈,但是他们对于书画的执着与热爱,仍然一如既往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代表人物

有哪些?“海云书派”的主要风格是什么?

陈澧:在书法方面,以天然和尚释函星为核心,门下有今无、今观、今释、今壁、今辩、今但、今印、今籍、今载等人的佛家书法流派。这个独特的书法群体的僧人,都与番禺雷峰的海云寺相关联,因而有“海云书派”之称。

绘画方面,则以清初的古毫、清中后期的宝筏较为知名。天然和尚既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佛门领袖,又是著名的书法艺术家。他以“禅通艺”,将佛理融汇于书法当中,其书法纯任天然、空灵静寂、道韵深邃,一种山林之气弥漫其中。天然的书法风格,是“海云书派”最具代表性的风格。但作为一个群体,海云书派又有着种种的丰富性与不同的个体风格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,给岭南书画艺术发展带来什么深远影响?

陈澧: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,堪称广东乃至全国宗教及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。清代岭南寺僧书画艺术之脉源流与时代背景、个体风格与群体面貌、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,都有着相当的研究意义。

“禅风雅意”:认识广州历史上独特的文化坐标

面特色都较为突出。”

据任文岭介绍,展览以岭南寺僧书画和海幢寺文化艺术为切入点,一方面系统梳理和呈现岭南寺僧书画艺术的发展状况和独特价值,一方面选取海幢寺这一典型个案,全方位立体展示其在诗文书画、经籍刻印、园林建筑、盆景艺术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突出成就,展示岭南寺僧在广东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特别贡献,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岭南优秀传统文化。

贰 海幢寺刻书与藏版: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

如果说岭南寺僧的兴起是以海幢寺为代表的文化现象,并非它独有,那么清代海幢寺在刻书、印经方面的成就却向来受到学界关注,它更是在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“经坊”的。从清初到清末,海幢寺出版的经书诗文集数量众多,经久不衰,其刻印出版的书籍,称为“海幢寺经坊本”。

羊城晚报记者:海幢寺在刻书、印经方面有什么成就?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?

林子雄:与展览中书画的内容和形式不同,在展览第二单元“经籍刻印”展示的是广州海幢寺刻印书籍的历史。海幢寺是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“经坊”的寺院,展览以一幅近代广州外销画呈现海幢寺经坊的情形,大门上有一“重来结集”匾额,意思是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集在这里得到汇编成册,印刷成书,广泛流通。

从清初出版时海幢寺住持道独和尚的《华严宝镜》为开始,至乾隆、嘉道年间,海幢寺刻书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达到了高峰,整个清代海幢寺共出版书籍110多种,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。

海幢寺在编辑出版佛教经典著作的同时,也刻印高僧的诗文集,如函星《睹堂诗集》、函可《千山诗集》、古云《月鹭集》、纯谦《片云行草》、宝筏《莲西诗存》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诗文集里大都附有一份助刻人士的名单,如《睹堂诗集》、《月鹭集》,各有100多位人士捐资助刻,这些助刻人士名单可以成为研究海幢寺历史的一个佐证。书中的书名、序言、题辞为天然、张维屏、黄培芳、鲍俊等名家书法所写,也是“禅风雅意”的另一种体现。

海幢寺的刻书、

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(题图受访者提供)

钟磬声声,读懂一座“文化的”海幢寺

叁 中西文化交流:构成了西方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



清代的“海幢寺”不但是广州五大丛林之一,也是商旅游览、文人雅集的场所,更是西方人窥探中国风土人情的指定场地。乾嘉年间,海幢寺一度成为两广总督的外事接待场所,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、荷兰德使团都是在此受到接见。19世纪末,来华的俄国使团也选择了广州,并指定参观海幢寺。

这一时期的许多游记与外销画都对海幢寺进行过详细记载和描绘。在这次展览的展品中,最引人注目的便是《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刻海幢寺水彩画册》(如上图),此册共48开,其中44开为水彩画,每一页均以图解形式用水彩及描金详细描绘18世纪的海幢寺各庙宇近景及庙宇内所供奉神像,并附折页式海幢寺测绘图,绘画之精细程度远超过其他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外销画作品。

羊城晚报记者:清代海幢寺为何会深受中外名士的青睐,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?它向当时的西方人展示了一个怎样的

广州?

李遇春:清代海幢寺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平台,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恰逢其时的历史机遇分不开。清代海幢寺位于广州城外,坐落在珠江南岸、伍氏花园和潘氏花园之间,与十三行隔水相望。它以珠江水路作为进入寺院的主要通道,是西方人从黄埔港坐船进入广州区域的第一个名胜景点,又处在黄埔港到芳村这一活动区域的中心点上,地理位置优越。当时洋行商人和传教士被限制在广州城外,对海幢寺的游历体会,构成了许多西方人对广州、乃至对中国的

第一印象。

除了具有地理优势,海幢寺环境优美、布局恢宏,园林、盆景艺术闻名遐迩,为清代省城大吏招待外宾提供了绝佳场所,也成为与外商交流、文人与商人交往、文人雅集之所。在西方人眼里,海幢寺作为广州名刹,代表着岭南的文化特色,在他们笔下,不仅记录了当时海幢寺精美宏伟的建筑,也细致描绘了僧人们在寺庙里的衣食住行。

嘉道年间,广州繁盛,岭南书画艺术界人才辈出,而海幢寺历代住持皆有很高的书画造诣,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海幢寺僧人,以独特的身份和超然世间的气韵,对诗书画艺术追求,令海幢寺成为方内与方外交往、文化交融的高雅平台。值得一提的是,清代海幢寺的刻书与印经,在短时期内形成规模,对传播宗教文化、提升寺庙名气也带来了极大帮助。

肆 禅意美学:素仁被誉为岭南盆景艺术一代宗师



“素仁格”盆景

木的发源地。“素仁格”盆景产生发展至今虽只有短短半个多世纪,但它却以独特的风格,在岭南盆景以至中国盆景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记。

释素仁(1894—1962),又名素人,俗名陈素仁,“素仁格”盆景的创始人。他十几岁时拜鼎湖山庆云寺亮思长老为师,后主法于广州海幢寺,曾任海幢寺住持、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第一届委员等职。

素仁酷爱盆景艺术,他擅长因材取势,作品清疏飘逸,尽显自然风貌,而又意趣盎然,在岭南盆景中独树一帜。素仁被称为岭南盆景艺术的一代宗师、岭南盆景三杰之一。

观众说

海幢寺,带给广州河南丰富的文化滋养

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

●受访嘉宾:吕子远
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,主要从事区域地方史研究,现从事艺术品拍卖工作

“老广州”喜欢把珠江以南称为“河南”,把珠江以北称为“河北”。“河南”这一叫法由来已久,据载从宋朝已开始。清代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里曾描述过广州的河南:“珠江之南有十三村,谓之河南。”河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广州下辖的一个行政区,直到1960年,河南区才改为海珠区。吕子远从小在广州出生长大,十余年前搬来海珠区琶口附近居住。琶口热闹的街市、海幢寺的碑刻钟铭、迷宫一样的龙导尾,让他产生了探索这片土地过去历史的兴趣。

“在中大历史系读博期间,接触到蔡鸿生教授对岭南佛门的研究、周湘老师对清初海幢寺新的探索、程家宝老师对于广州建市以前‘省城’观念的思考及黄素娟师姐博士论文有关广州城市史的考察,大大增进了我对广州河南的认识,也促使我自己有计划地去深入地解读这片地区。”2015年,吕子远参与了海幢街海珠故事系列《海幢》一书的编写,负责撰写该书的序言和上篇。他用了一年多时间,翻查文献,寻访古迹,希望藉这次机会,立足整个河南、整个广州,甚至更大的区域来解读这个地方,并围绕海幢寺讲述广州河南近数百年的发展变迁。《海幢》一书出版后,他对海幢寺和广州河南的关注仍在继续。

羊城晚报记者:海幢寺与广州河南地区有何紧密联系?

吕子远:在海幢寺以前,广州城对岸的这块沙洲,鲜被史书提及。直至清代海幢寺鼎建以后,才发生改变。一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,人们都会提到是天然弟子今无和尚的努力经营。但鲜有人留意到今无和尚是广州河南本地人,来自附近的沙园。

随着清代海外贸易的繁荣,海幢寺和广州河南不断见诸中西方的记载。一口通商时代,海幢寺是少数西方人可以自由游览的景点之一,西方人亦称把海幢寺称为“河南大庙”。清代以来,海幢寺一直是广州河南近河一带的地标,也是广州市区向珠江南岸扩张最初的落脚点。晚清河南近河一带市镇崛起,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不是设在海幢寺内,就是紧挨其附近。清末民初,河南被划入广州巡警第四局管辖,其公署就长期设在寺内。著名学府南武中学,最初也是借海幢寺开办。上世纪20年代,河南起家的李福林也在海幢寺内设置驻军大本营。当年李福林军部驻地,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10年,一直作为海珠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。上世纪30年代,广州城市扩展至河南,将海幢寺改建为“海幢公园”。公园的修建在当时是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建设重要内容,象征河南正式划入广州市区。

可见数百年来,河南地区发展与海幢寺紧紧联系在一起,海幢寺兴衰的历史,也是广州河南的发展史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历史上海幢寺与文人雅士、岭南画家的交往,体现出当时清代广州艺术圈的什么风气?海幢寺为广州河南地区带来了什么独有的文化滋养?

吕子远:海幢寺自清初鼎建以来,素有儒风传统,寺僧大多能诗会画,善于授物。此次省博的展览展出了多件天然弟子的书画,即可见一斑。清代中叶,海幢寺在广州城里人看来,远离尘嚣,是修禅雅集的好地方。嘉庆年间,江苏名士恽敬来游岭南,就在海幢寺参加了一次文人聚会,并写下《同游海幢寺记》,文中提及当时广州名士17人,其中包括这次展出有其作品的谢兰生。他的作品是写赠海幢寺僧澄波和尚的山水画卷。澄波是谢兰生日记中经常提及的人物,他们时常见面谈天下棋,欣赏古董。又如海幢寺所藏的刻本《片云行草》,是海幢住持释纯谦的诗集,集子前有张维屏序,末尾则收录了黄培芳、吴炳南、梁九图、曾照、颜惠、陈璞等人跋,都是当时广东的名士。晚清以来,寓居河南的画家也经常在海幢寺活动,何丹山、柯有榛、伍德彝、李寿庵等,我们时常能在他们的作品上看到海幢寺的土款。

羊城晚报记者:您认为海幢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与广州市民、海幢社区居民的当下生活能产生怎样的关联?

吕子远:自上世纪海幢寺改建成公园之后,它过去辉煌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。近年来,寺方一直在努力收集有关海幢寺和岭南佛门的文物,如今更集合各家馆藏一同以展览的方式呈现,让各类文物得以同时展现在公众面前,使人们不仅可以重新认识这座岭南名刹的多个侧面,也连带勾起许多尘封已久的广州历史记忆,像是明末清初岭南佛门的感人事迹,十三行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细节及珠江南岸的变迁轨迹等,对广州人的影响想必不仅仅是一场展览,而将持续地融入广州的城市文化中。